



高地文丛
瞿林东 著

中国历史文化散论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文化散论 / 瞿林东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366-9856-7

I.中… II.瞿… III.文化史—研究—中国 IV.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5781 号

中国历史文化散论

ZHONGGUO LISHI WENHUA SANLUN

瞿林东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瞿 敏

责任编辑: 周英斌 安 雪(特约)

责任校对: 周英斌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1 00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61 千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6-9856-7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瞿林东简介

瞿林东,男,汉族,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简明史学史》、《中国史学通论》,六卷本《中国史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以及《史学导论》(合著)等书,主编《历史·现实·人生系列》(七种)、《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年刊)。撰有《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等论文200余篇。

序

中国历史，悠久，厚重；中国文化，丰富，灿烂。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又反转过来哺育着世世代代各族人民，如此螺旋般地前进，形成生生不息的、连续发展的伟大机制。这个机制蕴含着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刻意识，蕴含着“彰往察来”的启示意义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生存、发展的土壤，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几十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我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逐步对中国史学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当然，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同样也不能不涉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这些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大多包含在我关于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理论的论述之中，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些零篇短简。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启迪，往往又不断激发起我寻求新知的欲望和不断上进的要求。唯其如此，不免敝帚自珍，今不揣鄙陋将这些零篇短简编为一册，献给读者。

本书所收入的一些文章，或读书所得，有感而发；或因学术活动的需要，命题作文。它们之间并无“系统”可言，但却也有一种内在联系。编入上篇的，谓之“历史与启示”，是从对历史的认识中得到的一些教益；编入下篇的，谓之“文化与精神”，是讲的思想上的收获。我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点点滴滴的认识，不过沧海一粟罢了。如果它们能够给读者一点启发，进而能够引起一些共鸣，那就是对我的极大鼓励！

十几年前，我曾经出版一本论集《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本书取名《中国历史文化散论》，聊以作为前者的姊妹篇吧。

我感谢重庆出版集团给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使这本小书得以面世。但从“高地文丛”来说，我又不免惶恐起来：“高地”未曾登临，何以答人所“问”！反之，我倒是真诚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重庆出版集团瞿敏同志为此书的策划费心费力甚多,本书责编周英斌同志为此书的编辑付出辛劳,我的一位博士生阎静同学协助我检阅、编次文稿,在此,我一并向他们衷心地表示感谢!

瞿林东

2008年5月21日



上
编
历史与启示

西周汉唐之盛与 总结历史经验



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的建立是划时代的事件。西周时期的物质生产、制度设施、思想成就，对后世都有极深远的影响。文、武、周公被视为“圣人”，是同西周的兴盛相关联的。文王奠基，武王灭商，周公对西周的巩固和发展有重大贡献。从《尚书·周书》来看，周公摄政期间及其归政于成王之初，他就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而发布的诰文，一方面分析现实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一方面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而阐述他本人与诰文训诫对象应当采取的正确做法。

首先，周公结合一些重大政治事务，在发布诰文时强调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如康叔就封殷地之前，他训诫康叔说：由于文王“明德慎罚”，上帝很高兴，“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代替殷来管理它的臣民。周公说：“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我们不能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我要告诫你怎样施行德政，怎样使用刑罚。周公最后指出：不要丢掉谨慎的作风，记住我的告诫，你和你的后人就能够世代管理好殷的遗民。^① 这里指出了“明德慎罚”是周之所以代殷的重要原因，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在分析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强调了“不可不监”的原则。又如，周公归政于

^① 《尚书·康诰》，参考王世舜译注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引《尚书》版本同。



成王的那年,便东行视察洛邑,同时有诰文之作。周公在讲述了营建洛邑的经过后,便讲到了有关总结夏、殷灭亡的教训的问题,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他们不敬重德行,才早早地丧失了从天那里接受的大命。现在成王承受了上天赐予的大命,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夏、殷两朝兴亡的原因,接受它们的教训,继承它们的功绩。周公最后说:希望大家都要有忧患之心,这样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接受上天的大命,能够像夏朝那样经历久远的年代,不至于经历像殷朝那样短的年代。这里提出的“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话,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论点,反映了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对历史经验的深刻认识。在周公看来,“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统治不是一劳永逸的,因此要有忧患之心;有了忧患之心,就能敬德;能够敬德,就能久安,即所谓“受天永命”。这同前面所说“明德慎罚”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周公还就前朝的一些具体的历史教训发布了诰文,如:

——关于戒酒。周公指出:我们西土之人不论上下都遵照文王的教导,“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殷朝的“先哲王”时,上上下下也不敢“崇饮”;后来就不行了,“荒腆于酒”,以至于“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这是很严重的教训。如果现在你们发现有“群饮”的人,就不要放过他们,把他们押送到我这里来,我要杀掉他们。你们要听从我的教训,不要让你们治下的臣民“腆于酒”(《尚书·酒诰》)。司马迁记商纣王“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这样的天子,岂有不亡之理?而西周初年强调“不腆于酒”,自是一件大事。

——关于“罔厉杀人”,“勤用明德”。周公认为,要使周的统治“至于万年”,就应长期实行“保民”的政策。从这一政治见解出发,他强调要总结周人兴起时先王所实行的德教的历史经验(《尚书·梓材》)。

——关于“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周公训诫那些不安分的殷朝遗民说,上天不会把大命赐给那些不施行德教的人。凡四方小国、大国的丧亡,都是因为自身有过错而招致丧亡这样严重的惩罚。为了阐明这个



道理,周公讲述了“成汤革夏”的原因,是因为夏朝末年的统治者太放纵自己;又讲述了“自成汤至于帝乙”都能“明德恤祀”,把殷朝治理得很好,而帝乙以后诸王就做得很差了,变得骄奢淫佚,招致了丧亡的大祸。这里,周公讲述了夏、殷、周的兴亡史及其经验教训(《尚书·多士》)。

——关于“君子所其无逸”。周公告诫成王不要陷于淫佚,为此他举出殷朝的中宗、高宗、祖甲三王和周文王的榜样,认为他们是通达明智之君,应以他们的做法为鉴戒(《尚书·无逸》)。此外,关于用人问题,周公举出夏桀、殷纣用人的错误和周文王、武王用人的成功,以此告诫成王要选用贤人来治理国家(《尚书·立政》)。关于善始慎终的问题,周公告诫周的贵族说,周朝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否能顺利发展、长久存在,这都是我不敢预料的,要记住殷朝灭亡的大祸,要时时想到天意和民心(《尚书·君奭》)。周公还反复训诫殷的遗民,给他们分析夏、殷兴亡的历史原因和周兴起的依据,告诉他们其中有必然的道理,要他们懂得同周人和睦相处,否则是要受到惩罚的(《尚书·多方》)。

通观周公的这些诰词可以看出,这是西周政治统治不断巩固、完善的过程,而举凡重大措施无不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相联系。可以这样说,周公从摄政起至还政于成王之初的若干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年代,其思想成果不仅对“成康之治”、西周的繁荣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可见这种影响之大之远。

二、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

同西周比起来,西汉建立之初,最高统治者汉高祖缺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自觉意识;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种意识一旦被启发出来,其积极影响却是深刻而巨大的。

汉高祖的这种自觉意识的产生同汉初一位儒生有关,他就是陆贾。陆贾是楚地人,以有辩才而从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信任。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下了他在汉初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



(汉初定)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以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怩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酈生陆贾列传》）

可以想见，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这个人的文化素养并不高，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因而能够采纳臣下的合理建议。他命陆贾总结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汉初统治集团，以皇帝为首这样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西汉初年乃至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制定和贯彻，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陆贾说的“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跟后来贾谊说的“取与守不同术也”，是相通的。从这个历史的联系中，可以窥见汉初知识分子在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代治国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认识，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陆贾《新语》十二篇中的第四篇，即《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无为”“宽舒”“中和”，即是对秦朝“用刑太极”政策的否定，也是直接影响到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理论根据之一。汉初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朝廷同异姓封国的斗争，有刘氏集团同诸吕集团的斗争，有同姓封国同朝廷的斗争等等，但“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国策相沿未改，在较长的时期里得到了贯彻。

司马迁显然十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他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实际效果。他在《吕太后本



纪》后论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穡，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所记述的史事，大多是关于诸吕同刘氏宗室及开国功臣争夺权力的斗争，以及吕后在这个斗争中的种种残酷手段。从上文所引司马迁语来看，说明他在总结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的功过得失时，没有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而着眼于这一时期的总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识非同凡响之处。而所谓“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同刘邦废秦苛法，萧何“顺流与之更始”，陆贾提出“逆取而以顺守之”的历史经验和“无为”的主张等等，一脉相承。这里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国策，即顺应民心，与民休息。这一国策在文、景时继续得到贯彻，所以司马迁一再称颂文帝的“盛德”：“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史记·孝文本纪》后论）“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史记·孝景本纪》后论）司马迁这样盛赞文帝是有道理的，因为正是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中，西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在惠帝、吕后时期“民务稼穡，衣食滋殖”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文景之治”。

同西周初相比，这次总结历史经验的活动，一是参与的人更多，从刘邦、陆贾到贾谊、晁错，不少政治家、思想家都参加了讨论；二是延续的时间更长，从高祖、吕后到文帝、景帝，历时四十多年。当然，只是到武帝时期，司马迁以一个史学家所负有的历史责任，以其深刻的思考和见识，详尽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回答了汉高祖所提出的问题，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三、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唐初统治集团包括唐高祖、唐太宗、令狐德棻、魏徵等君臣，对史学的社会作用有极深刻的认识，反映了他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有深切的理解和高度的重视。这是史学思想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唐初又超出了西汉初年和西周初年。其政治



上的结果,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出现。

唐高祖根据令狐德棻的建议,于武德五年(622)下达《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指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对修史的重视,反映了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重视,对历史经验在现实活动中的重要性的重视。所谓“六代史”,是指梁、陈、北魏、北齐、北周和隋,这同西周初年论殷朝历史、西汉初年论秦朝历史有类似之处。

唐太宗为秦王时,就十分注重学习历史知识,研究历史经验,他同他的属官虞世南“共观经史”,“商略古今”,讨论“古先帝王为政得失”(《旧唐书·虞世南传》)。后来,虞世南根据这些讨论,撰成《帝王略论》一书。唐太宗即位后,每每与大臣们商讨治国安民之道,无不引古论今,非常重视历史经验,这在玄宗时期的史学家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中,有很多记载。通观贞观朝的历史,凡重大举措都是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在一起的。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正式设立史馆于禁中,命史官们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636),五史修成,唐太宗很高兴,他在表彰史臣们的同时,阐述了他对历史经验的见解,他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絀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

所谓“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是其对待历史经验教训的基本宗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句话,并非虚言饰词,而是唐初统治集团的实际想法。唐太宗还这样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旧唐书·魏徵传》)“览前王之得失”,当然主要是吸取隋朝的教训。在唐初统治者看来,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隋朝,怎么一下子就“率土分崩”“子孙殄灭”(同



上)了呢?唐皇朝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摧垮了隋皇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初统治者不能不认真地吸取这一历史教训,以作为巩固自身统治的借鉴,这就是“为在身之龟镜”了。例如,唐太宗批评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于合理”。他批评隋炀帝“求采无已”,“竭人财力”。唐太宗还认为“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嘲笑秦始皇、汉武帝信求仙事是“非分爱好”,以致或“沙丘而死”,或“便行诛戮”(以上均见《旧唐书·太宗纪》)。

唐太宗的这些看法,无疑都贯彻于周、齐、梁、陈、隋五代史中。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魏徵主编的《隋书》。这因为要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是《隋书》的重要课题之一。如《隋书·炀帝纪》后论称:

(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戮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这里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指出了隋炀帝的政策的错误。结论是:“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

在《隋书》卷七十后论中,魏徵还进而指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从而说明隋亡与秦亡的相似之处。

这种从不同的侧面来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的议论,在《隋书》中比比皆是。唐初统治集团这种“以史为镜”的思想,对唐代史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对唐代政治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唐太宗本人曾亲撰《金镜》一文(见《全唐文》卷十),作为时时对照的一面“镜子”,可见他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真诚的重视。贞观年间,一些基本国策的制定,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都



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经验教训的因素。譬如,唐太宗君臣都认识到秦、隋之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这就是“过役民力”。因此,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成为他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贞观政要》的《俭约》篇记贞观元年(627)唐太宗称引秦始皇营建宫室遭到人民反对的史实,乃放弃营造宫殿的计划,“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奢纵》篇记贞观十一年(637),马周上疏陈时政,讲到夏、殷、周、汉的历史经验和魏、晋、周、隋的历史教训,指出当今“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休时”,很不妥当,应恢复贞观初年的政策。《务农》篇记贞观二年(628),唐太宗讲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时,大臣王珪指出“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的教训,以及“亡隋之辙,殷鉴不远”的事实,希望唐太宗“慎终如始”。唐太宗表示要“安人宁国”,“克己自励”。所有这些都表明,唐太宗君臣从现实状况和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减轻人民负担。由此出发,人们不难窥见“贞观之治”基本国策的思想基础。此外,如唐初关于“偃武修文”的“教化”政策的确定,关于不实行分封制度的决定等,魏徵、李百药诸人也都是把历史经验教训和当时形势结合起来予以论证的。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这句话,透露出他在读史过程中学习到了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他作为一代英明君主,作为“贞观之治”的核心人物,他说的这句话该有多么重的分量!

西周、汉、唐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都十分注重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所得到的启示,作为制定基本国策和重大举措的指导原则之一,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出现了彪炳于史册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有力地表明,西周、汉、唐之盛同总结历史经验之间,自有一种必然的联系。那么,这种必然的联系又给今人什么启示呢?这使人想起了龚自珍的名言:“欲知道者,必先为史。”(《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尊史》)

(原载《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



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从汉代社会来看，尤其如此），是一部关于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从现代的学科分类来看，不论是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美学，还是天文学、地理学等等，都可以选择一个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而且也都可以总结出司马迁在这些方面的成就，并对我们有所启发。这些研究，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都具有科学史研究的价值。但是，《史记》毕竟首先是一部史书，是一部通史著作。从史学的本来的意义和主要的目的来看，从《史记》的着力所在和精彩之笔来看，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他本身所意识到的肩负的历史责任来看，我认为《史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详尽地、深刻地而且也是生动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这是司马迁奉献给人们特别是后来的人们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和蕴含丰富的历史智慧。

司马迁对秦汉之际历史经验的总结，从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上起秦国的兴起，下迄武帝时的强盛，内容极为丰富。概而言之，我以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汉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订了什么样的国策？



——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战国中期以来至西汉前期大约二百七八十年间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有的则是属于他那个时候的当代问题。司马迁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非但没有回避这些重大问题，而是以严肃的态度、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和神奇的史笔回答了这些问题。

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一

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并没有以自己的口气作许多评论。他只是在《秦始皇本纪》的后论中简略而含蓄地写道：“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体。”这两句话，既概括地写出了秦国发展、强大的过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的宏大的超越前人的政治抱负，也隐约地揭露了他蔑视历史、目空一切、专横自恣的政治品质。从根本上说，这两句话也就是对《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所记的秦国历史的一个总结。接着，司马迁全文引用了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并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显然，司马迁是同意贾谊《过秦论》所提出的看法的，他是要借用贾谊的看法来回答上述问题的，这是司马迁历史评论的一种独特的形式。

贾谊的《过秦论》分析秦国自缪公以来不断强大、终于统一全国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有利的地理形势，即所谓“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这种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优胜之处是：六国攻秦，秦可以逸待劳，“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随，荷戟而守之”；于是六国逐渐疲惫，而秦国则锐气养成，加之政治上的“远交近攻”方略，乃能逐一击败各国，完成统一事业。关中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优势，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